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5月18日 (第260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国如何与中等强国打交道

中等强国的战略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中实现必要的战略目标，胜过其发展与美国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至于外围国家或弱国而言，学习与邻近的地区大国共处和合作，比盲目追随美国的路线更可取。美国应该意识到，外交是与中等强国打交道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战略。

中美关系

美专家：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恐加剧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杂志网站 5 月 2 日登载荣鼎集团高级经理瑞瓦·古戎 (Reva Goujon) 的文章称, 随着欧洲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政府强硬的对华战略, 美中可能陷入新一轮紧张局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 全球经济和安全局势日益恶化。供应链断裂、金融制裁、关键商品出口禁令等综合因素导致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 美国和欧洲达到了 40 年未有的高通胀率。更可怕的是, 整体性地缘政治动荡的浪潮正在那些处于欧洲边缘、极度脆弱的国家 (突尼斯、也门等) 中酝酿着。战争拖得越久, 以美国为首的制裁联盟就越有可能出现裂痕。虽然中国难以与印度、巴西等国组成统一阵线, 但其“相互尊重”的主权观念聚集了足够多的伙伴, 能够降低美国“长臂制裁” (long-arm sanctions) 的影响。

此外, 美国政府即将推出更全面更严格的对华遏制战略。在一些关键领域, 战略的轮廓开始显现: 1) 美国可能在免除更多产品关税的同时提高针对敏感商品的关税; 2)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将加大审查力度, 并要求不遵守信息披露规则的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 3) 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将进一步收紧, 美国还可能联合七国集团制定协同战略。

俄乌冲突的“回旋镖效应” (boomerang effect) 加上美国愈发强硬的对华政策, 均预示着美中关系可能即将在今夏迎来挑战。

美国前外交官：中国在联合国的金融影响力 “威胁”美国领导地位

美国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网站近日登载前美国外交官安德鲁·海德（Andrew Hyde）的文章称，中国在联合国预算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恐撼动美国在该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在履行其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问题上仍停滞不前。这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国在该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的广泛支持，从而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契机，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背道而驰。

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在联合国开支中所占的经费份额也连带上升。21 世纪初，中国在联合国经常预算中的分摊份额约 2%。到了 2022 年，该份额飙升至 15.25%，预计在未来十年将继续快速增长。中国最初不愿接受这一地位所赋予的领导角色，但近年来，中国积极为联合国的活动和发展方向建言献策，并逐渐了解到如何利用该组织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中国在联合国资助问题上的言行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显然意识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也明白恢复和巩固美国多边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但尽管拜登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为偿还欠款而努力，但美国会始终不愿为此提供必要资金。就目前而言，美国拖欠联合国的维和费用高达 10 亿美元，并将进一步增长。

目前，联合国正积极应对乌克兰危机，针对联合国许多部门的审查和要求变得更加严格。美国希望联合国成为其领导世界的关键工具，但能否确保该组织拥有充足的、可支配的资金是衡量一国领导力的关键指标。美国要想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拿出可信的付款计划并贯彻到底，还要强调它对联合国工作的重视以及它在全球事务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学者：美国应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抗衡中国

美国军事评论网站 War on Rocks 5 月 3 日登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助理亚历克斯·斯蒂芬森 (Alex Stephenson) 等人的文章，详细分析了人工智能对美中潜在军事冲突的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美中若爆发军事冲突，其后果难以想象，必须尽一切外交手段避免此类危机。但对于美国国防规划者而言，有必要考虑最糟糕的情况。虽然人工智能可能无法决定美中战争的结果，但这项技术能大幅增强两国的军事能力。对中国而言，投资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能抵消美国目前的军事优势。

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优先考虑其进攻能力，最直接和最深刻的影响将来自智能弹药，以及已在开发的维护和后勤系统。若美中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攻击美国的传感器和通信网络，达到干扰美方行动，离间西方盟友体系的目的。同时，中国可能会使用人工智能来增强其水面舰艇的杀伤力和攻击范围，这将置美国海军于危险之中。

要想在美中战争中取胜，美国必须提升各军种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对此，美国国防部提出了“联合全域指挥和控制”概念 (Joint All-Domain Command and Control)，该概念的实施有赖于人工智能的开发。基于此，文章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美国必须准备好削弱和对抗中国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美国防部应该继续监管中国对先进设备、数据和资本的获取途径，中国人工智能设备供应商应更多地被列入相应出口管制清单；第二，美国应改变防御性的战略，先一步发展“反人工智能” (counter-AI) 和“反自治” (counter-autonomy) 技术以抗衡中国；第三，美国应该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对智能弹药和联合作战传感器的研发，以保持对华竞争力；第四，

美国军方在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和更新其指挥和控制系统时必须留意潜在的网络漏洞。为了确保网络安全，美国应采用“零信任架构”（zero-trust architecture），在网络开发过程中的每一步安插验证。这有助于挫败中国使用机器学习来识别和攻击美国关键网络漏洞的计划。

CSIS 专家：美西方制裁措施的对华威慑力有限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 5 月 3 日登载该中心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的文章称，美西方在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应将其应用于中国，但要警惕类似制裁的威慑力十分有限。文章摘要如下：

美西方对俄制裁有三个主要目标：事先经济威慑；破坏内部金融和市场稳定性；削弱后续军事能力。目前来看，第一个目标显然已经失败（未能阻止冲突的爆发）；第二个目标在早期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之后俄罗斯通过灵活的财务管理、资本管制和持续的能源出口逐渐稳定了卢布和银行业；第三个目标也许是长期的，美国及其盟友对技术和工业零部件的出口管制对此尤为重要。

若要将类似制裁应用于中国，必须考虑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的区别：首先，中方领导人一旦决定采取军事手段收复台湾，其决心将远胜普京。其次，中国大陆将从俄罗斯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加大力度储备物资和弹药，并且将考虑持久战下的后勤问题。最后，台湾地区的地理位置增加了美西方提供补给的复杂性。美西方后两项制裁目标的实现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乌克兰在地理位置上直接连接了西方。外国武器和弹药的稳定流入大幅提升了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军队的的能力，而军事补给的等效战略在台湾问题

上是不可行的。因此，分析来看，似乎只有第一个目标经济威慑值得考虑。

对于希望对华保持可信的经济威慑的美国决策者而言，文章提出四点建议：1) 提前做计划。民族主义目标可以压倒经济逻辑，不要指望经济一体化能防止冲突；2) 提前与盟国协调。了解优先事项，建立红线，并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在危机爆发之前，一个团结的国际联盟能在塑造中方行为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3) 危机爆发后，要清晰传达红线，并明确经济后果；4) 如果红线被越过，尽早实施广泛且严厉的制裁，以表决心。

总结来看，决策者不应自满或过度依赖经济威慑。即使存在相应计划，美西方领导人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经济威慑可以替代军事威慑。若经济威慑失败，美国军队可能会直接介入到台湾问题当中。

皮尤：美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持续上升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登载该中心高级分析师劳拉·西尔弗（Laura Silver）等人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近期由皮尤开展的，针对美国人对华认知的最新民调结果。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人对中国的总体认知有所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描述为世界领先的强国。根据民调数据显示，约 66% 的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43% 的受访者称中国是与美国并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国家军事能力的看法，70% 的受访者仍然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军事大国，虽然只有 19% 的人在此问题上回答了中国，但该比例较 2020 年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长被视为“威胁”，美国人对中国的

负面看法再创新高。8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该比例较202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这些美国人中有42%表示对中国“有点不喜欢”，40%则是“非常不喜欢”。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通常伴随着对中美关系的消极态度。70%的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不好”，其中58%认为“有些不好”，12%认为“非常不好”。

尽管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有所增加，但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敌人。在所有受访者中，62%的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25%的人将中国视为“敌人”，10%的人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比例较1月的民调结果有所下降（35%），这与俄乌冲突的爆发有密切关系。

与以往类似，民调结果存在一定的党派差异。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无党派人士（89%）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往往比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无党派人士（79%）多。在经济问题上，党派分歧尤其大。共和党人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看法更消极，支持对中国优先采取强硬措施。

民调结果还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别。在所有受访的美国人中，年长者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看法更负面。针对台湾问题，在6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52%的人认为海峡两岸紧张关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在18至29岁的受访者中，只有约26%的人持相同观点。

美国外交

美专家：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缺乏连贯的外交战略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5月13日登载美国国防问题专家伊桑·布朗(Ethan Brown)的文章称，军事援助不是外

交政策的替代品，美国应带头推动俄乌冲突的和平解决。文章摘要如下：

俄乌冲突陷入了僵局。对此，美国非但没有鼓励俄乌双方尽早达成和平协议，反而向深陷战争泥沼的乌克兰援助了更多军事资源。近日，美国众议院再次批准了一项 400 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 60 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美国的行为说明了两个要点：第一，美国缺乏能够维护欧洲和平、连贯一致的外交战略；第二，在缺乏能够促进关键地区稳定的明确战略的情况下，美西方指望仅依靠军事力量加以补充。

硬实力确实是美国的强项，这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然而，在国际秩序和全球环境已然发生变化的当下，美国仍被一种观念所束缚，即可以在不了解战争动机以及整体局势的情况下迫使对手投降。因此，对乌克兰持续且猛烈的军事援助与美国在阿富汗长达 21 年的战争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过分强调军事资源的致命性，缺乏连贯的政治目标。军事硬实力并非有效外交政策的合适替代品。相反，军事力量应该是实现大战略的工具，并且在不使用时最有效。

传统基金会专家：美国应重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

近日，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网站登载其国际经济问题研究员安东尼·金（Anthony B. Kim）等人的文章称，乌兹别克斯坦身处中亚战略重地，发展美乌关系有助于美国建立反俄联盟。文章摘要如下：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战略要塞，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1992 年，美国是最早承认乌兹别克斯坦脱离苏联独立的国家之一，此后 30 年间美乌双边关系不断发展。2018 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济约耶夫 (Shavkat Mirziyoyev) 造访白宫，美乌关系进入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

自 2017 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经济自由度在过去五年中取得显著进展。作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兴经济体，乌政府未来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稳定性，强调私有化、鼓励私营部门，降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虽然乌兹别克斯坦未来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乌政府，但美国持续的战略支持对于推进其改革也至关重要。美国可以把握双边建交 30 周年的契机，通过建设性参与私营部门来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联系。

乌兹别克斯坦拥有比其他中亚国家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它既不与俄罗斯接壤，也不是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因此对俄依赖比其他前苏联国家要少得多。对美国而言，发展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双边关系有助于美国建立反俄联盟。

哈德逊研究所专家：拜登政府缺乏明确的国防预算战略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网站近日登载美国国防政策分析师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 (Andrew F. Krepinevich) 的文章称，美国安全正面临多重风险，但政府尚未提出有关国防预算的明确战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国正处于现代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即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美国很有可能会失败。在经济实力的支持下，中国正努力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以加强自身在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伊朗也渴望在中东占据主导地位；朝鲜进一

步扩大其核武库；全球恐怖主义仍是一个巨大威胁。

然而，纵使面对上述挑战，拜登政府的国防预算和总体规划却呈现出“一切照旧”的姿态。美国政府似乎乐于将国防预算保持在其冷战时期 GDP 份额的一半以下，甚至低于美国单极时期的水平，而彼时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远不及当下。拜登政府的政策十分矛盾，他明确“民主”和“威权”之间的冲突，却支持那些忽视美国安全威胁的群体提出的预算方案，结果导致国家安全与实现安全的手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文章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拜登政府应将必要资源投入到国防项目中。虽然想重新找回美国在单极时代曾拥有的绝对军事优势并不现实，但可以采取措施以解决目标与手段不平衡的问题，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保障。

第二，由于资源有限，国防战略必须做出优先排序。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无疑是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必须将其整体国防建设转向西太平洋，积极维持亚太联盟体系，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

第三，美军必须适应战争性质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进步有望激发未来军事竞争中更具破坏性的转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忽视近期的安全需求。

第四，拜登政府必须要求军队提供明确的“作战概念”，包括如何完成核心任务的计划，并据此调整其国防预算和军事行动。

实现上述目标并不容易，这些做法也难以恢复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避免由“威权国家”主宰世界必须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美国如何与中等强国打交道

中等强国的战略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中实现必要的战略目标，胜过其发展与美国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至于外围国家或弱国而言，学习与邻近的地区大国共处和合作，比盲目追随美国的路线更可取。美国应该意识到，外交是与中等强国打交道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战略。

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网站5月2日登载了国际政治理论家阿尔塔·莫伊尼 (Arta Moeini) 等人的文章称，在多极化、中等强国崛起的新世界秩序中，美国需要多一些战略同理心。文章摘要如下：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拜登对战争、俄罗斯及普京本人进行了愤慨的道德抨击，并呼吁各国站队。但与“9·11”事件后美国鼓动的全球反恐战争不同，这一次美国赢得所谓“道德之战”的实际意义和战略意义都不大。一方面，美国缺乏在乌克兰直接部署军事力量的利益、意愿和资源。另一方面，“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已走到尽头，国际体系更加多极化，中等强国崛起，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

尽管中等强国因地理、历史和文化原因而局限于特定区域，战略目标也因此受限，但其相对实力强于邻国，在各自的地区安全复合体 (RSC) 中具有十足的影响力。中等强国在复合体内坚定地维护符合本国利益的秩序，反对不利的秩序，较难受到外界胁迫或被征服。对此，美国应予以充分关注，并认真考虑这些中等强国的诉求。俄乌冲突虽然破除了俄罗斯作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神话，但其仍是世界上最具实力的中等强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军火库以及扩大势力范围的综合实力。然而，美国却忽视

俄罗斯在地区安全复合体内的地位及安全诉求，犯下了严重错误。

面对当前的俄乌冲突，许多国家不再一边倒地支持美国。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拒绝与美国一道谴责俄罗斯的国家（如印度、巴西等）之间存在结构性同侪关系（peership）：它们都属于中等强国。中等强国的战略模式可以概括为：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中实现必要的战略目标，胜过其发展与美国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至于外围国家或弱国而言，学习与邻近的地区大国共处和合作，比盲目追随美国的路线更可取。美国应该意识到外交是与中等强国打交道的首要，乃至唯一的战略。

2022 年俄乌冲突前后美国的表现与 2001 年的反恐战争一样，以所谓“正义之名”牺牲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推动中等强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愿景。但不同的是，当前国际体系呈现多极化特征，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正在计划建立一个新的平行金融体系。对美国感到失望的中等强国会认为全球金融中心转向中国的趋势是有益的。美国必须学会接受多极化和中等强国崛起的现实，调整姿态，避免再次自取其辱，牺牲重要国家利益，尤其是损害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美国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来结束涉及中等强国的冲突，而不是任由冲突恶化和升级。

美国政治/其他

参议院多数席位对民主党的重要性

美国新闻评论网站沃克斯（Vox）5 月 2 日登载该站政治与政策记者李周（Li Zhou，音译）的文章称，即使民主党在中选中失去了众议院，也需要努力维持其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文章摘要如下：

根据历史经验，总统所在政党在中选中通常表现欠佳，加上美国国内持续上涨的通胀率，民主党的选举前景似乎越来越严峻。民主党大概率将失去众议院，并且在参议院没有犯错的余地。在政府分裂的情况下，民主党人在立法上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而参议院掌控着三个对民主党而言至关重要的领域：

其一是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若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便能够投票否决拜登政府的司法提名人，支持其认为更温和的人选，全面阻止民主党的战略考量。若民主党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将严重阻碍拜登为实现联邦法官多元化所做的努力。由于联邦法官终身任职，因此，任何一个任命决定都将产生长期影响。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任命了 200 多名法官，这些法官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口罩令以及堕胎权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二是设定立法重点。目前，民主党作为参议院多数党能够制定议会时间表，并选择性无视共和党人从众议院提交的法案。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情况将有所不同。尽管参众两院通过的任何法案仍有可能被拜登否决，但在此过程中，共和党人可能会迫使弱势的民主党人就有关争议的问题进行投票。

其三是主导调查行动。共和党在国会任何一个议院中重获多数席位都会积极制衡拜登政府。共和党人此前宣布，若成功控制众议院，将深入调查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海外商业行为，甚至弹劾拜登的某些内阁成员。若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则可以确保众议院委员会不会将听证会精力集中在探讨此类问题上，并且有可能使遭弹劾的政府官员免于审判。

2022 年中选对民主党而言十分关键，从本质上讲，民主党在本选举周期内赢得的席位越多，就能更好地应对未来两年的政治变动。

《卫报》：民主党应以“文化战争”为契机获得竞选优势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5月6日刊载其专栏作者斯蒂芬·菲利普斯(Steve Phillips)的分析文章称,拜登政府中期选举策略正面临失败前景,民主党应积极迎战由共和党发起的“文化战争”,主动出击争取多元文化群体支持。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正进行一场国家身份之战:美国究竟是一个以异性恋、白人和男性利益为主的基督教国家,还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文化的民主国家。右翼分子正积极地各个层面为第一种观点造势,而民主党中期选举策略却采取了避免斗争的方式,对右翼分子的种种行径避而不谈,反制措施也过于低调和无效(除了之前围绕“罗诉韦德案”所做的努力)。此举直接导致民主党支持率急剧下降,尤其是有色人种的支持率较去年高点下降了24%。当前的民主党过度痴迷于争取保守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却忽视了不断壮大的有色人种队伍和白人进步青年。为扭转局面,拜登应积极投入到“文化战争”的斗争中去,并借此提高有色选民和青年选民的投票热情。

民主党控制了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事实说明美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多种族国家的价值观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对民主党而言,中期选举的关键是投票率问题,控制白宫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通常表现不佳,是因为该党支持者往往认为再次投票的必要性不迫切。民主党若想赢得中期选举,就有必要通过“文化战争”去激励支持者投票。

拜登政府可以从以下四点出发向选民释放积极行动的信号:

- 1) 白宫应与民权运动及医疗保健机构的领导人举行一次关于“生育自由”的战略峰会,讨论如何反击右翼推动的限制性立法以及扩大女性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 2) 拜登应在佛罗里达州组织一次支持同性恋的会议,当面反驳该州州长和立法机构的恐同

倾向，会议地点可以选在因对同性恋友好而被惩戒的迪士尼世界，以此提高美国商界的参与度；3) 拜登应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学校举行有关黑人身份的活动。该州有近 100 万满足条件的非裔美国人在 2020 年没有投票，拜登此举能向其发出强烈信号；4) 拜登可与选民登记团体一道走访选区，以对抗南部、西南部压制选民的立法，声援选民登记团体。

美专家：“文化战争”疏离了大企业同共和党的关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网站 5 月 12 日登载了 CNN 专栏作家阿里克·威尔森（Arick Wierson）等人的评论文章称，共和党发起的“文化战争”不仅疏离了自身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还在一步步将美国推向近百年来最大规模政治调整的边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共和党内受“让美国重新伟大”（MAGA）运动启发的文化斗士，与支持低税收和放松管制的传统保守派之间的碰撞愈演愈烈。随着文化狂热分子逐渐控制了共和党，美国大企业逐渐意识到共和党不再是盟友。多年来，大企业与共和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始终是双赢局面，前者获得了友好的商业政策，后者获得了丰厚的政治经费支持。

尽管与共和党断绝关系较艰难，但对于美国大企业来说，代表美国未来的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在社会和政治前景方面明显比过去几代人更进步、更多元化、更包容。若对这些变化的情绪视而不见，企业最终可能遭受不可挽回的声誉损失。因此，在这场“文化战争”中，越来越多大公司在支持进步政策和谴责对权利和自由的侵蚀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而自然地与民主党人站在了同一阵营。

民主党的进步派历来不喜欢大企业。但大企业可以为民主党提供许多支持，例如庞大的竞选资金、强大的媒体和沟通渠道、对国会的游说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党人未来可能会将企业及其管理者视为平衡性力量，以对抗共和党在最高法院、国会等机构占据优势的现实。随着在文化和政治问题上的持续介入，美国大企业逐渐成长为“第五权”（媒体是“第四权”），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民主党领导层需要重新思考与大企业之间的战略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共和党初选结果显示特朗普党内影响力不减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网站5月4日登载其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的文章，以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改选的初选为例，对特朗普的党内影响力进行了研究。文章摘要如下：

在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举行初选前，只有得克萨斯州在3月1日举行了初选。特朗普在得州仅支持了两位挑战者：莫妮卡·克鲁兹·埃尔南德斯（Monica de la Cruz Hernandez）和卫斯理·亨特（Wesley Hunt），两人都赢得了初选。

在印第安纳州，有28名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国会两院初选。特朗普支持的6人均为现任议员且其中5人无争议通过，唯一一位拥有挑战者的候选人格雷格·彭斯（Greg Pence）也轻松击败了对手。在俄亥俄州，有44名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国会两院初选，受到特朗普支持的有12人。在这些候选人中，有9人是现任议员或进行了无竞争性的席位竞选。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们包括竞选参议院席位的万斯、众议员席位的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和麦迪逊·格斯奥托·吉尔伯特（Madison Gesiotto Gilbert）。

最终，特朗普支持的三位挑战者都通过了初选。与得州的情况类似，尽管数量不多，但特朗普力挺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

评估特朗普实力的第二种方式是观察候选人中追随特朗普的与远离特朗普的人各自表现如何。两州的初选中有许多候选人是特朗普的追随者。在印第安纳州的 28 名共和党候选人中，11 人（39%）明确支持 MAGA/特朗普愿景，14 人（50%）则以主流保守派的身份参选。特朗普的追随者们共赢得了超过 36% 的名额，而主流保守派稍多，占据 43% 的名额。而在俄亥俄州，44 名共和党候选人中，14 人（32%）明确支持 MAGA/特朗普愿景，22 人（50%）以主流保守派的身份参选。俄亥俄州的初选结果与印第安纳州相反，特朗普的追随者赢得了 50% 的名额，主流保守派仅获 32%。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在关键地区均获得了胜利，这充分证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力不减。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